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年第2期 (总第38期)

■ 谢 超

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

■ 麻昌港
■ 韦国善
张 立

中国—东盟关系定量研究

■ 苗中泉

建设国家军事能力的政府因素探究

■ 贺 平

贸易政治学的个体主义视角

■ 任 娟

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Institut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 2014年. 第2期/阎学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097-5837-3

I. ①国… II. ①阎… III. ①国际政治-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622号

国际政治科学 (2014年第2期)

主 编 / 阎学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郑茵中

高明秀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程雷高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9.25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字 数 / 135千字

印 次 /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837-3

定 价 / 2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政治科学

2014年第2期（总第38期）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文正仁（延世大学）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

布赞（Barry Buzan，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田中明彦（东京大学）

石之瑜（台湾大学）

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牛津大学）

托（William Tow，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

张睿壮（南开大学）

沈丁立（复旦大学）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普林斯顿大学）

埃文斯（Paul Evans，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贾庆国（北京大学）

猪口孝（日本中央大学）

萨尼（Varun Sahni，尼赫鲁大学）

阎学通（清华大学）

彭佩尔（T. J. Pempl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编委会：

主 编：阎学通

副 主 编：陈 琪

执行主编：漆海霞

组稿编辑：孙学峰 刘 丰 徐 进 李 巍

评审编辑：周方银 马燕冰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明斋313室

邮政编码：100084

电 话：010-62798183 62786457

传 真：010-62773173

电子信箱：CJIP@mail.tsinghua.edu.cn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1 | 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 | 谢超 |
| 31 | 中国—东盟关系定量研究 | 麻昌港 韦国善 张立 |
| 49 | 建设国家军事能力的政府因素探究 | 苗中泉 |
| 88 | 贸易政治学的个体主义视角 | 贺平 |
| 119 | 联盟政治影响强制外交的效果
——评《比铁板一块更糟糕：亚洲的联盟政治与
强制外交问题》 | 任娟 |
-
- 134 注释体例

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

谢 超◎

【内容提要】 通过对1974年和1998年印度核试验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证，本文认为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这使得其实际国际地位与自身期望存在落差，印度对自身实力的高自信和不稳定国家自尊易引发攻击行为。印度通过核试验这种攻击行为向外界宣示实力，其目的在于获得国际认可和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在信号传递效果方面，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成本影响信号传递效果，技术水平体现国家实力，成本反映决心。印度在1998年核试验中的技术水平和对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反映出印度争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潜力，获得了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的认可。

【关键词】 核试验 国家自尊 大国地位 印美核合作

【作者简介】 谢 超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xiechaocn@gmail.com。

本文主要关注印度核战略及实践在印度获取大国地位外交方略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1998年核试验之后，从之前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经济 and 军事制裁，到随后印美核合作的不断发展，印度在核领域的长袖善舞让世人惊讶。本文力图探析印度进行核试验和追求

* 感谢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组织的工作坊讨论，感谢庞珣老师在讨论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由笔者负责。

核国家地位的动因，对该问题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印度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实力的策略能得到既有国际体系，特别是体系内主导大国美国的认可和支
持的原因。因此，在梳理和批判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核试验在传递印度国家实力信息方面的作用机制，探寻印度是如何通过核试验释放信号并获得美国对其国家实力的认可，从而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借此分析和总结印度核崛起和大国外交策略，思考中印外交的走向。

一 既有研究成果回顾

对于印度多次进行核试验和追求核国家地位尤其是在 1998 年进行系列核试验的原因，学界有很多解释。一些学者强调印度国内的政治变化导致了印度核政策的变革，特别是在核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印度人民党取代长期占据印度政治主导地位的国大党上台执政后，印度核政策很快就发生了变革。因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印度人民党在 1998 年 3 月执政后，5 月 11 日和 13 日印度就进行了 5 次核试爆，使得第一个提出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倡议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废弃这个宗旨的国家，因此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是导致印度核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¹ 该观点对于国内政治层次的分析十分重要，但是需要注意到的经验事实是在此之前，印度国大党一直是印度追求核国家地位的主要推动者，没有自 1974 年印度第一次核试验以来的经验和技術积累，人民党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核试验的能力。² 另有报道显示印度进行核试验的打算由来已久，早在 1995 年

1 Sumit Sarkar, "The BJP Bomb and Aspects of Nation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3, No. 27, 1998, pp. 1725 - 1730; Gaurav Kampani, "From Existential to Minimum Deterrence: Explaining India's Decision to Test,"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6, No. 1, 1998, pp. 12 - 14; 张位均:《印度核试验与南亚安全》,《当代亚太》1998 年第 6 期,第 9 页。

2 早在 1980 年 3 月回答印度联邦院议员质询时,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就宣称如果国家利益需要,印度将毫不犹豫再进行一次核爆炸。参见《印度甘地夫人宣称必要时将再次进行核试验》,法国《世界报》1980 年 3 月 15 日。

就准备进行核试验，但因美国间谍卫星和情报部门发现了有关迹象并公开披露，印度迫于压力而中止。^①可以说印度核试验的雄心在前，人民党执政后只是扣动了印度进行核试验的扳机，从时间顺序上不构成因果关系，因此人民党执政无法全面而充分地解释印度核试验的动因。

另外有一部分学者强调国家间因素，即印度政府一直强调的所谓安全威胁，一是巴基斯坦带来的现实威胁，二是中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印度进行核试验和成为事实核国家的行为只是为应对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②也有学者综合以上国内政治因素和外部威胁因素，认为影响印度核试验决策的国内因素是人民党上台执政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外部因素则是印度面临的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两者相互作用促使核试验决策的出台。^③但上述观点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对于巴基斯坦的现实威胁一项，印巴两国的冲突史虽然能验证巴基斯坦对于印度的现实威胁，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都占据上风，并且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还实现了分解巴基斯坦的目的。长期以来印度对于巴基斯坦的常规军事优势是明显的，印度没有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进行核试验来平衡比自己弱的对手带来的威胁。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带来的威胁不足以构成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因，因此单独强调中国对印度构成的“威胁”，即印度追求核国家地位是为了平衡中国核实力的威慑和在未来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核平等地位，因此做出核试验的决策。^④强调中国对印度带来的所谓潜在威胁，这也是印度政府在核试验之初对外解释的主要理由所在，但这一解释面临的挑战在于，虽然印度重视中国强大影响力值得理解，但是在印度对外强调的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是保持现状的国家，反而是印度在不断挑起争议；在印度强调所谓中国

① 王军平、柳缠喜：《印度在核试验前的情报封锁》，《现代军事》1999年第2期，第54页。

② Sumit Ganguly,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The Prospects and Sources of New Del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148-177.

③ Samir K. Sen, "He who rides a Tiger: The rationale of India's nuclear test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8, No. 2, 1999, pp. 129-136.

④ Andrew B. Kennedy, "India's Nuclear Odyssey: Implicit Umbrellas, Diplomatic Disappointments, and the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2, 2011, pp. 120-153.

援助巴基斯坦威胁到印度安全层面, 从全球层面来看,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更多的是为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以及制约“疆独”势力的发展。^① 如果印度核试验决策的动因是应对“中国威胁”,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贯穿下去, 由于中国的“威胁”一直都存在, 印度在 1974 年核试验之后就应该一鼓作气继续试验以正式拥有核威慑力量, 因此此类观点无法解释印度为什么又放下“中国威胁”而在等待了 24 年后再进行核试验。事实上,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都有所改善, 例如中印两国先后于 1993 年 9 月和 1996 年 11 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② 此时印度做出核试验的决定, 不但冲抵了之前各方为缓和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促使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作为报复, 南亚次大陆反而有陷入核军备竞赛的危险, 中国的反应虽然克制但也强烈谴责印度的核试验行为, 印度进行核试验并没能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 反而使得局势逆转走向恶化。

综上所述, 笔者发现关于印度核试验动因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印度国内政治因素或渲染中国等外部威胁, 本文注意到印度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动因, 但是在讨论印度国内政治的变化时不应该单纯强调政权更迭, 而是应该对印度外交战略层面及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行分析, 从中找寻到推动印度核试验的互动机制。笔者认为印度核试验最大的动因在于战略层面, 印度核试验的目的在于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国际地位的认可, 因此应着眼于研究其国家实力和相应的国际地位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印度外交中, 争取获得大国地位是其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首要议题, 因此必须把印度核试验动因放入印度追逐大国地位的整体外交考虑中, 从印度大国外交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的互动层次出发, 深入解析印度核试验的

^① Kanti Bajpai, “Strategic threats and nuclear weapons: India, China and Pakistan,” in M. V. Ramana and C. Rammanohar Reddy, eds., *Prisoners of the Nuclear Dream* (New Dehli: Orient Longman, 2003), pp. 36 - 39.

^② 前者协定文本可参见 <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gx/zywx/t753019.htm>; 后者协定文本可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1/11/content_233680.htm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动因，才能有助于学界更好地了解印度核计划的历史和现状，以理解和把握中印关系未来走向。本文力图通过国家“自尊—攻击行为”的分析框架，构建关于印度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印度进行核试验的动机在于维护国家自尊和争取国际地位；虽然核试验并不必然增加国家实力，但的确能够传递关于国家实力的信息，有助于弥合印度对国家实力的判断与外界判断之间存在的差距；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成本影响信号传递效果，高水平核试验释放关于国家实力的可靠信号。

二 基于自尊—攻击行为的分析框架

社会心理学对自尊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和群体两个水平，学术意义上的国家自尊概念是否存在和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国家与自尊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强调国家是服务于个体的利益和需求的，从而确保它们的自尊。^① 此时的自尊概念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内部个体的自尊。但是，民族国家的认同是由个人成员的认同构建的，个体的自我形象受到国家地位的强大影响，自尊是自由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人们的自尊与所属国家群体所拥有的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得不到尊重，那么与之相连的个体荣誉和自尊也就无从谈起。^③ 此时，有必要把自尊与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体自尊受到群体自尊的影响，个体荣誉和自尊的内在要求会使得其所属的群体应当为个体的认同、普遍的尊严和免受歧视、仇恨和压迫做出贡献，由此

① Isaiah Berlin 研究并揭示了自尊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受压迫民族或阶级谋求认可，它们认为外部的统治是侮辱，使得尊严受损，蒙受屈辱。参见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Henry Hardy ed.,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9); Henry Hardy ed.,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Knopf, 1991)。

② 1993年，Berlin 的学生 Yael Tamir 在其著作 *Liberal Nationalism* 中论证认为一个安全的、受尊敬的富强国家下，个体的福祉也得以张扬，因此个体把自己的自尊与福祉与共同体内其他成员和共同体本身的成败联系起来。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得出的论断是只有所在的国家得到尊重,个体才能拥有自尊。^①自由主义的内在要求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人所在的环境和认同的尊重,因而对国家的尊重就显得尤其重要。^②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中直接提出了“国家自尊”的概念和重要性,他引用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名言,认为民族是由有共同语言和共向历史记忆的群体组成的,民族(而不是国家)拥有道德属性,因此拥有自豪感和荣誉感,民族只有在相应自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唤起对于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以及所取得成就的共同认可。^③

因此,本文力图通过传播学的社会心理学传统构建关于印度核试验动机的分析框架。传播学的社会心理学传统起源于社会心理学,是传播学中影响极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核心思想是把行为体当作“社会人”加以研究,关注的主题是行为、个体特征和产生某种行为的认知过程。^④笔者认为,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可以较为有效地解释印度核试验的动机。^⑤长

① Avishai Margalit and Joseph Raz,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87, No. 9, 1990, pp. 439–461. Avishai Margalit 和 Joseph Raz 认为自尊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显而易见,根本就无须证明。Kai Nielsen 在论证民族自治问题时也引用了自尊概念,国家认同给予成员生活的意义,决定后者的自尊、归属感和安全感,后者这些属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在。Kai Nielsen, “Cultural Nationalism, Neither Ethnic nor Civic,” in Ronald Beiner ed., *Theorizing Nationalism* (Albany: SUNY Press, 1999), pp. 119–130.

② Neil MacCormick, “Is Nationalism Philosophically Credible?” in William L. Twining ed., *Issues of Self-Determination*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总体来看,众多文献研究表明自尊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关于自尊概念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的论据支撑。相当部分的研究都是关于被压迫国家的例子,即自尊受到损害的国家例子,但是相关学者并不认为自尊概念只适用于或大部分是与被压迫国家相关,理由在于无论国家安全与否,个体获得自尊都是非常重要的,引用最多的例子包括魁北克、巴勒斯坦、库尔德等。尤其是在魁北克的例子中,个体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没有面临歧视或屈辱,没有被强迫讲另一种语言,领土也无被占领的威胁,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也得到充分保障,包括语言权和极大的自治权,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例子。

③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参见〔美〕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49页。

⑤ 20世纪80年代,关于自尊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中关于自尊与攻击、被攻击行为的关系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William James 早在1890年的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中就定义自尊=成功/抱负水平,即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的感受取决于实际成就与潜在能力的比值。攻击性行为可定义为有意伤害别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许可的行为。参见章志光《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317—344页。

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低自尊容易导致攻击，但此结论并没有确凿的理论模式或实验证据加以证实。^① 有心理学家在实证研究了1000多个澳大利亚孩子的欺负行为的自我报告后得出相反的结论：受欺负者通常具有较低的自尊，表现出较强的自卑感。^② 经验数据证明，长期以来大家认为低自尊易导致攻击行为的看法是错误的，而认为高自尊导致攻击行为显然也过于草率，重要的是从高自尊人群中区分出易发生攻击行为的群体，即自恋和不稳定的高自尊群体，即外界对高自尊者凸显自身优越性的特质进行公开质疑和反驳时，其攻击行为容易发生，此时的攻击行为表现为捍卫自尊的手段，也就是说自恋和不稳定的自尊可以极为有效地预测攻击行为。^③ 关于这种自尊和攻击的关系，可以从理论上解释为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为反抗对自我的破坏和怀疑，个体将采取攻击作为捍卫手段。

自恋和不稳定的自尊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说明了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因果关系，即从施动者层面分析了攻击行为发生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框架下的归因理论，即通过实际发生的行为来推断行为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行为的发生与解释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行为，各种不同行为也可被解释为源于同一个原因，当然，同一行为也可能源于多个不同的原因，因此，需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解决这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归因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① 早期很多学者以此结论为前提进行研究，例如 Ervin Staub, *The Roots of Ev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eprint edition; Jack Levin and Jack McDevitt, *Hate Crim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3), 但都缺乏实证依据。后来有学者曾发表观点认为有暴力倾向的母亲往往是低自尊者；还有一种说法是缺乏自尊的人通过暴力的形式来得到自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暴力也可看作是提高自尊的一种手段。但是很多研究发现拥有自我提升精神的大多是高自尊者而非低自尊者，低自尊者是较缺乏自我提升精神的。Roy F. Baumeister et al.,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3, No. 1, 1996, pp. 5-33.

② Phillip T. Slee and Ken Rigby, "The Relationship of Eysenck's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Self-esteem to Bully/Victim Behavior in Australian School Boy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14, Issue 2, 1993, pp. 371-373.

③ Roy F. Baumeister et al.,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p. 5-33.

帮助我们从事行为及其结果中推导出行为的意图和动机。

海德从通俗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归因理论。^① 伯纳德·韦纳进一步发展了归因理论的三个主要论点：第一，个体的性格差异和成败经验等影响着他的归因；第二，个体对前次成就的归因将会影响到其对下一次成就行为的期望、情绪和努力程度等；第三，个体的期望、情绪和努力程度对成就行为有很大的影响。^② 社会判断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归因理论，认为在归因过程中拥有的信息越多，对该行为所做出的推论的对应性就越高；一个行为越是异乎寻常，则观察者对其原因推论的对应性就越大。该理论据此提出了影响对应判断的三个因素：(1) 非共同性结果。它是指所选行动方案有不同于其他行动方案的特点。(2) 社会期望。当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动时，我们很难推断他的真实态度。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或不为社会所公认时，该行为很可能与其真实态度相对应。(3) 选择自由。如果我们知道某人从事某行动是自由选择，我们便倾向于认为这个行为与某人的态度是对应的。如果不是自由选择的，则难于做出对应推论。^③

① 海德认为事件的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内因，如态度、人格、能力等；二是外因，如外界压力、情境等。在归因的时候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共变原则，即某个特定的原因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和某个特定结果相联系，该原因不存在时，结果也不出现，我们就可以把结果归于该原因。如一个人老是在考试前闹别扭、抱怨世界，其他时候却很愉快，我们就会把闹别扭和考试连在一起，把闹别扭归于考试而非人格。二是排除原则，它是指如果内外因某一方面的原因足以解释事件，我们就可以排除另一方面的归因。如一个凶残的罪犯又杀了一个人，我们在对他的行为进行归因的时候就会排除外部归因，而归于他的本性等内在因素。Fritz Heid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② Bernard Weiner 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ttribution Theory* (New Jersey: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4).

③ 非共同性结果指所选行动方案有不同于其他行动方案的特点。例如，一个人站起来，走去关上窗户，穿上毛衣，此时我们可以推断他感到凉了。单是关上窗户的行动也可能表示防止窗外噪音，而穿上毛衣这个非共同性结果就可以使人推断这个行动是由于凉。社会期望，即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动时，我们很难推断他的真实态度。如一个参加晚会的人在离开时对主人说对晚会很感兴趣，这是符合社会期望的说法，从这个行动很难推断其真实态度。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或不为社会所公认时，该行为很可能与其真实态度相对应。如上述参加晚会的人在离开时对主人说晚会很糟糕，这是不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它很可能反映出行动者的真实态度。选择自由，即如果我们知道某人从事某行动是自由选择的，我们便倾向于认为这个行为与某人的态度是对应的，如果不是自由选择的，则难于做出对应推论。Muzafer Sherif and Carl I. Hovland, *Social Judg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根据以上理论启示，在研究印度核试验的动因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对于自身实力抱有高自信，而且国家自尊不稳定时，容易出现攻击行为，印度核试验攻击行为表现为捍卫自尊的手段。

研究假设二：在国家抱负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与攻击行为的强度成正比。

研究假设三：印度前后两轮核试验的信号传递效果不同，核试验技术水平反映实力，成本反映决心，实力和决心影响信号传递效果。

根据威廉·詹姆斯关于自尊的经典定义，自尊决定于潜能的实现与自以为的潜能之间的比率，个体的抱负是分母，成功是分子，因此自尊 = 成功/抱负。依照这一公式，在自己看重的领域认为自己有能力或事实上取得了成功属于高自尊型；反之，在自己看重的领域缺乏能力或遭受失败则属于低自尊型。因此参考以上定义，本文将印度国家自尊定义为印度国家潜能的实现与自我判断的潜能之间的比值，即印度的国家抱负是分母，国际地位是分子，因此印度的国家自尊 = 国际地位/国家抱负，即印度对于自身价值的感受取决于国际地位与其认定的自身国家实力的比值。印度属于高自信和自尊不稳定类型国家，原因在于印度认为在国际地位竞争中自己是有能力的竞争者，即高自尊型，但是遭国际体系及主导国忽视或轻视，又属于低自尊型，即构成了本文所指的不稳定国家自尊类型。印度对自身国家实力的判断和外界判断之间的差距，导致印度认为自身实力与国际地位之间并不对称，这种高自信与不稳定自尊易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这种行为表现为有意挑衅国际社会且从事不为国际规范所许可的行为，印度选择的是核试验。

正如前文的自尊—攻击行为理论所展示的，攻击行为也可以有很多方式，这里的攻击行为的表现方式是印度进行核试验，因此需要说明印度为何选择进行核试验作为挑战方式。对于21世纪的国际社会来说，通过核能力来获得大国地位是非常不理性的，对于美国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印度成为核国家是否意味着增加了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奥氏反驳说：“印度人是

在开玩笑吧?”^① 因此,我们必须从研究对象的政治背景和战略文化出发,找出看似不理性行为背后的理性因素和动机。对于印度政府和印度国民来说,核武器就是通向大国地位的通行证。印度的一位前国防部长曾说,“核武器是使一个国家得以在宴会头桌吃饭的东西”,以为拥有核武器就拥有了大国地位的“核武器情结”在印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② 长期以来,印度精英阶层和公众舆论强调拥有核武器与大国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他们看来成为世界大国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为核国家。

核梦想是印度大国梦想的一部分,通过宣扬核能力实现大国地位在印度国内有着长久的影响力。在印度还没有获得独立以前,尼赫鲁就表达了他的大国思想,指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是不能打动我的,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③ 虽然在尼赫鲁时代,印度在国际领域表现出非凡的影响力,但以当时印度的实力,要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客观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在尼赫鲁执政的 17 年中,在他的战略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核战略传统有三个方面:对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强烈支持没有偏见的全面核军控与核裁军;不关闭将来发展核武器的大门。^④ 早在 1948 年印度就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开始了追求核国家之路,印度的核计划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苏联)等国的帮助。1954 年,印度首先提出缔结全球范围的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的倡议。1960 年,印度在加拿大的帮助下建立了希罗斯反应堆,为印度核武器计划初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8 年,印度拒绝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1974 年 5 月,印度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显示自己

① Evan Thomas, “Ground Zero,” *Newsweek*, May 25, 1998,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20806567.html> (访问时间:2013 年 7 月 12 日)。

② 汪诘:《错误时间的错误行动—印度核试验述评》,《世界知识》1998 年第 11 期,第 4 页。

③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第 57 页。

④ Rajesh M. Basrur, “Nuclear Weapons and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8, No. 2, 2001, p. 186.

已具备制造核爆炸装置的能力。在 1974 年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后，印度历届政府都只是奉行“保留核选择”的政策，即将核能力保持在“模糊状态”下，即坚持不放弃核选择，外交上不承担义务，以非公开的方式发展核武器而又不宣称自己是核国家。^① 印度的核梦想自此之后一直在坚定地推进，直到 1998 年 5 月核试验之后，印度正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印度已经掌握核武器制造技术，成为一个事实核国家。

笔者认为通过对构建关于印度国家实力不同判断的分析框架（参见图 1），可以有效解决印度核试验动机分析中存在的研究困境。无论是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还是印度与中国的国际竞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原因，即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印度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是对其国际地位不满，强调“中国威胁”也是因为在国际地位竞争中中国的吸引力和国际地位高于印度。这种对自身实力的高自信与其国际地位的不对称导致印度的国家自尊受到损害，即当印度在国际舞台不断遭受忽视，国家实力并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时，攻击行为容易发生，此时的攻击行为表现为捍卫自尊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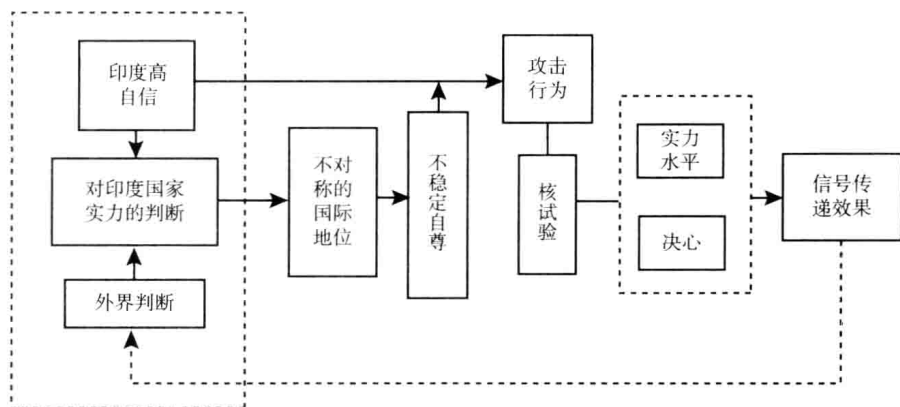


图 1 自尊—攻击行为互动机制

^① 马加力：《印巴核试验及其对南亚安全态势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7 期，第 20—21 页。

正如下文将论述到的,从1974年和1998年核试验时间点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这种不稳定国家自尊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三 基于1974年和1998年核试验的实例论证

在印度看来,核实力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备能力,核实力虽然并不必然增加国家实力,但可以向外界有效传达关于印度国家实力的信息,这也是印度选择通过核试验来传达信息的原因所在。正如下文即将论证的,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这种高自信与其国际地位的不对称导致印度国家自尊的不稳定,引发印度通过核试验这种攻击行为向外界宣示实力以捍卫国家自尊和争取国际地位。在准备本文议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对1974年印度首次核试验的研究材料和成果相对较少,这与该次核试验的效果和影响力偏弱有关。在对印度核战略的研究中,笔者认为1974年首次核试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注意到首次核试验与1998年系列核试验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下文将结合1974年和1998年印度核试验情况对此进行论证。

本文认为印度前后两轮核试验的攻击强度和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是与攻击行为的强度成正比的。如前文所述,核试验行为是由印度对国家实力的高自信和不稳定的自尊所导致的,根据“国家自尊 = 国际地位/国家抱负”的定义公式,在国家抱负不变的情况,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与国际地位落差成正比:^① 国际地位落差越大,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越大;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越大,攻击行为的强度越高。印度的国家类型在1974年和1998年前后没有发生改变,即属于不稳定自尊类型。但正如

^① 简要证明如下: 国家自尊损害 = 实际国家自尊 - 期望国家自尊, 由于期望国家自尊 ≥ 实际国家自尊, 国家自尊损害 ≤ 0, 根据国家自尊 = 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那么国家自尊损害 = (实际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 (期望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 (实际国际地位 - 期望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 国际地位落差/国家抱负 即当国家抱负不变时, 国家自尊损害与国际地位落差成正比。

前文所述，经过 24 年的经济发展和核实力的秘密发展，印度对自身国家实力更加自信。不过，这种增长了自信对应的现实是印度的大国地位仍不被国际社会及主导国家所认可，印度的国际地位落差更大，因此 1998 年核试验所展现的攻击强度要高于 1974 年。本文认为通过比较印度政府对前后两轮核试验的不同表态和期望，可以展现出前后两次攻击行为的强度不同，即印度政府决策核试验和之后的表态可论证本文的研究假设二。正如下文即将论证到，这种攻击强度也在 1998 年系列核试验的策划过程和展示的的决心和实力方面，即从结果层面再次得到印证。

首先谈一下印度对自身国家实力的判断。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6 年中，印度军队的规模从 17.5 万人增至 200 万人，并且建立了机械化和现代化部队，尤其是组建了现代海军和空军。庞大的军需和战区物资供应刺激了印度工业的发展。^①虽然近代历史上经受了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但在印度独立后，其对外战略充满了战争与冲突：自 1947 年独立以来，印度先后对巴基斯坦发动了三次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最终导致巴基斯坦肢解，东巴脱离巴基斯坦，成立了孟加拉共和国；挑起中印边界战争；长期以来在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实行强权政治，吞并锡金王国，不丹成为其事实保护国，长期干预尼泊尔内政外交；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从印度的对外行为可以看出，印度对国家实力是拥有高度自信的。

印度对国际地位的渴望则反映在其大国梦想方面。尼赫鲁时代正是两极格局下美苏争霸时期，尼赫鲁凭借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外交手段开展大国外交，印度在国际领域表现出非凡的影响力，但此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以当时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要成为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如果说尼赫鲁时代的大国外交在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后让印度回到现实，那么后来的经历更是加重了

^① 林太：《印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 326 页。